

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综述

■/李启维

摘 要:经济学者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心理学中对主观幸福感研究基础上的。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都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不同方法。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外、国内两个方面总结了学者对幸福感的测度和研究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 幸福感 收入 政府支出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70(2017)02-0067-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取得较大进步、生活比较富足的同时,生活节奏逐渐的加快以及住房、医疗、养老等生活压力的出现,使得“幸福”成为我国居民当今最主要的热议话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一个重要指示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国民幸福理论研究的实质是“以人为本”,致力于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创建一个“幸福中国”。本文以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外、国内两个方面分别总结了学者对幸福感指数的测度以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一、幸福指数测度研究

(一)国外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

关于如何测度幸福指数的问题,国外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主要是公式法、调查问卷法和微观法。较早提出用公式计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给出了计算幸福的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并且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人的自尊、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五大类,从而得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的结论,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对幸福指数进行定性

分析。随后,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结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出真正的幸福应该等于个性、生存需求和高级心理需求之和,其中,个性包括世界观、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忍耐力等;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财富状况等;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期望、雄心、幽默感等。显然,罗斯维尔的方法更侧重于个人方面,而在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与英国地球之友组织公布的一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中显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该份报告结合了人们对自我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社会生态环境,人力成本等多方面的指标,也将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除利用上述方法外,有些学者还通过设计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幸福指数的测度,这种方法以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设置的问卷调查最具代表性。该研究机构首先将幸福感划分为五个等级并给予不同的分值,非常幸福给予5分,十分幸福给予4分,不很幸福给予3分,不幸福给予2分,十分不幸福给予1分,然后对被访问者提出如下问题:综合目前的生活状况,你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不幸福及十分不幸福?最后,通过搜集并处理被访者的答案计算出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

幸福指数。由于这种调查问卷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此在之后关于幸福感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此问卷调查的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如卡明斯以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为基础,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设计了澳大利亚居民幸福指数调查问卷,这份问卷包括两个指数和六大层面,从个人和国家角度分析评价了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六个方面。

另外,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幸福指数测度问题也是一种较常用的手段。如2004年,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与艾伦·克鲁格发表了《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DRM)》。根据此方法所设定的框架,利用减少回忆偏差的程序系统,从而引导被测试者重新回想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情景,进而对被测试者的幸福感进行评估。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DRM方法从微观推广到宏观,同时也可以把类似于快乐原理以及对快乐的测度推广到对国民幸福的测度,从而计算出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

(二)国内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

虽然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起点晚,但是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些学者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最主观的感受,因此可以从主观上来构建幸福指数。如邢占军从心理学出发,结合相关心理学理论,编制了主观幸福感测量表,他把幸福感按照重要程度从高到低分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浙江财经学院陈惠雄教授从个体、亲情、收入、职业、社会和生态6个方面,在对主观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快乐指数调查量表》。也有些学者认为幸福感指数不仅要包括主观方面也要包括客观方面的一些指标,因为他们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受自身因素影响也会受到环境、社会、家庭等因素影响。如李军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统计方法构建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客观指标包括生活质量、物质条件、社会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4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中又包含了若干个二级指标,诸如平均预期寿命、组织文化活动次数、移动电话普及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罗建文、赵嫦娥通过公式 $H=0.6A+0.4B$ 来计算国民幸福指数,其中H表示国民幸福指数;A表示通过客观评价得出的数值,

主要包括:居民工作、收入、生存环境、精神生活、身体状况以及相应的三级指标;B表示的是通过主观评价得出的数值,主要包括对生存状况、生活质量、情绪愉悦、人际交往和谐、婚姻家庭以及个人阶级实现的满意度。这种方法几乎涵盖了所有因素,但是在权重的选取上却存在着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如何合理、客观的构建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国外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方面,国外的学者主要是从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角度进行分析的。

在收入方面,可细分为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差距三个方面。其中,绝对收入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Easterlin, Graham and Pettinato,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Lelkes等研究了同一国家同一时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同一个时点上,富人的主观幸福感要比穷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二是Stevenson and Wolfers研究了在同一国家内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随时间的变动关系,他们认为短期内,收入增长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Easterlin et al后来又发现从长期(≥ 10 年)来看,收入增长不能持续提高主观幸福感,即存在“幸福—收入悖论”。而在相对收入方面,Feer-i-Carbinell, Clark, Bolton等假定存在某个参照组,经对比研究发现对于收入低于参照组的人群来说自身收入与参照组收入水平的差额使他们的幸福感程度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效应;而对于收入高于参照组的人群来说,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所产生的正效应则相对要低,这也说明收入对幸福感产生了棘轮效应。此外,Blanchflower和Oswald使用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首先把收入平均分成五组,再把第五组的平均收入与第一组的平均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显著影响了美国居民的幸福指数,而且是呈现负向影响的关系;而Alesina et al, Di Tella and MacCulloch综合利用欧洲晴雨表调查和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并研究美国以及欧洲收入不平等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无论是对左翼居民的幸福还是对右翼居民的幸福而言,收入不平等对其都没有影响,并且加入基尼系数这一变量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在失业方面,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个体失业和总体失业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个体角度上,Di Tella et al、Frey and Stutzer、Helliwell等把主观幸福感作为连续变量研究,发现失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失业者的得分要比就业者的得分低5%到15%左右。当Weinzierl和Ferrer、Carbonell and Gowdy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了个体特征、健康状况、人口因素等变量后发现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后来幸福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了解释:一个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失业会导致收入减少从而会使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下降;另一个是从心理学上考虑的,因为失业会使人产生压抑、焦虑甚至是耻辱感等负面情绪,从而会导致丧失自尊和社会孤立,最终也会导致人们的幸福感下降。在总体失业或者说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率上,Oswald, A. et al对1975到1991年欧洲1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总失业率增加1%就会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2.8%,而当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时也同样得到了下降的结论。对此,幸福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那些没有失业的人因害怕失业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以及对那些失业的人表示同情或者是担心犯罪率上升和社会动荡不安从而导致国民幸福感降低。

在通货膨胀方面,当控制了无法观察到的变量之后,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一致的消极影响。如Alesina et al、Di Tella et al、Graham通过研究欧洲、拉丁美洲、美国以及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结论几乎一致。而且Wolfers的研究还发现频繁的通货膨胀波动也降低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此外,就通货膨胀和失业哪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Clark做了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他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失业降低国民幸福感程度要远大于通货膨胀,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失业影响的是少数人,而通货膨胀影响的是

社会中所有的人。

近年来政府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幸福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而研究的角度主要是政府支出并且更多的是进行实证分析。Bjornskov et al研究认为当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时,税收也相应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支出降低了国民幸福感,但是Ram运用包括转型经济体、发达国家、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在内的145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把人均GDP、投资物品价格、社会信任度、国家开放程度和后共产主义国家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政府支出水平的指标进行研究,却发现政府支出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ena等研究了13个转型国家的政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他发现政府支出达到某一个阈值前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的,当政府支出超过这一阈值时就会产生负向的影响。Zohal Hessami在对12个欧洲国家从1990年至2000年的居民调查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结论,即政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

以上是幸福经济学学者从政府总支出方面研究政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是从政府的具体公共支出方面进行研究的。比如Di Tella et al等研究了欧盟11国政府的失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够系统的提高社会平均幸福水平。Bjornskov等对芬兰政府的健康支出进行了研究,发现政府的健康支出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也会越高。Rober W. Wasmer等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在公共安全支出方面的支出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也就越强。

在政府质量方面,Helliwell和Haifang Huang是最先研究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和世界价值观数据库中75个国家在1981-1997年报告的幸福均值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导致各个国家的居民幸福状况产生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各个国家政府质量的不同,即使是在控制了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条件下,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随后,Ou使用“HIN”数据库对130个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了什么样的政府才能称之为好的政府,他提出好的政府应该是尊重居民,

能够给居民创造较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并且能够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政府,而且政府质量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结论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还存在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其他不同体制的国家。而 Teorell 研究也发现政府只有公正地执行政治权威才能实现政府目标,公正的政府能够降低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得居民能够在低风险的环境下规划生活并获得幸福,这也说明了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在之后的研究中, Helliwell 和 Haifang Huang 将世界治理指数中的 6 个指标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包括了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第二类包括了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而经济学家 Ott 又将这两类指标分别概括为政府技术质量指标和政府民主质量指标。基于 Helliwell 和 Haifang Huang 对政府质量的分类标准, Altindag 和 Xu 把样本按照 GDP 的高低进行分组,发现政府质量对 GDP 水平高的国家即富国的影响较显著,而对 GDP 水平较低的国家即穷国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利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因为富国居民对物质层次的需求已经满足了,所以会追求非物质层次的需求,但是非物质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靠的是公民权利、民主程序等政府质量的改良,而不是收入的增长;可对于穷国的居民而言,基本物质层次需求的满足是居民幸福增长的主要来源,所以对非物质层次的需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二)国内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的学者也主要是从收入、政府公共支出或亲贫式支出、宏观税负以及政府如何能够让国民幸福几个方面来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选取的方程式。

在收入方面,罗楚亮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的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可见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另一结论,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不高也说明应更加关注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

素。任海燕、傅红春基于中国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利用相关系数法和有序概率回归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收入差距与居民之间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特别是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负向影响较显著。阳义南、章上峰使用中国综合调查 2006、2008、2010 年数据,采用了多阶段、多层次随机概率抽样方法将这三组数据组合为一个混合横截面数据并使用离散选择序数模型进行估计,研究了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我国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公平感上升一个等级,被访问者幸福感平均下降 8.4%。但是没有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居民,幸福感会显著更低,并且二者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没有社会保险会进一步加剧被访问者的收入不公平感,进而降低其幸福感,而相对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平均提高 5.32%,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仍有显著影响,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李清彬、李博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调查的微观数据和 Hansen 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估计出中国国民的幸福—收入门限值大致在人均收入 3000 元的位置,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从门限前的显著正向变为门限后的不显著。这也充分说明对于我国而言,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需要更加关注非收入的因素,尤其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自身权利、平等和公平等软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又依赖于公平发展方向上的体制改革。

关于政府公共支出或亲贫式支出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模型以及结果都大致相同。如鲁元平、张克中、胡洪曙等大多都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中国部分,并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动态的时间序列上还是静态的省际横截面上,我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发生背离的现象,即存在“幸福悖论”,而且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宏观税负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主要是体现在显著性上。赵新宇、姜扬、范欣使用吉林大学公众幸福指数课题组于 2012 年 7 月进行的吉林省范围调查的数据,建立有

序概率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宏观税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仅有十分有限的负面作用,而亲贫式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提升有明显作用,且作用足以抵消宏观税负的消极影响。当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利用中国综合调查 2006 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除使用有序概率模型外,有些学者也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研究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如李军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提炼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再以因子分析结果为基础建立包含潜在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罗泯以重庆市居民的幸福感的为例通过比较不同因子,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地区等分析了我国国民幸福感背后的本质以及影响因素。孙求华、林洪以逻辑和递进的方式从个体幸福感数据收集方法、总体国民幸福感指标和计算方法、总体幸福感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国民幸福的影响因素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理想的方法。而在吴静的研究中采用决策树模型估计各个影响因素对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程度,并用均值比较和对应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各个影响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指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宏观管理是所有因子中最薄弱的因子,因此应该提高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

在政府质量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刚、李树把管制、腐败等作为衡量政府质量指标来研究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作者采用中国综合调查 2006 年数据证实腐败的确显著降低了中国居民的幸福。而且,在处理了腐败变量的内生性后,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还明显增强了,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如果按照居民家庭收入、户籍和所属地区将样本进行分群、检验还发现腐败只是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降低高收入家庭居民和城

镇居民的幸福感,同时,腐败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并未有明显的差异。当陈刚、李树使用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 3 个指标来综合刻画中国城市一级的政府质量时,得出了上述类似的结论。

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和政府也渐渐的把国民幸福感作为其政策施行的目标,但依然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各国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国民幸福感的理论依然相对匮乏,大多都是对已有理论的验证和工具的直接使用;其次,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很强,涉及面也很广,而国内外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微观层面选取相关指标进行测量,从宏观角度构建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相对较少;再次,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利用自陈式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幸福指数,进而讨论政府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利用宏观数据构建国民幸福指数,进而研究政府规模、政府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加稀少;最后,未来幸福感的研究需要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融合,包括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因此,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也将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和修正以及实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保罗·萨缪尔森.美.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 [2] 瓦西留克.体验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3] Robert A Cummins.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An Interactive Model[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0(52).
- [4] 吴静.社会发展进程中居民幸福测度与实证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 [5]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23).

- [6]李军.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编制及影响因素分析[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
- [7]罗建文,赵嫦娥.论居民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15).
- [8]鲁元平,王韬.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10(05).
- [9]Ferrer,Carbonell, Gowdy.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0).
- [10]Bjornskov.C., Dreher.A., Fischer, J.A.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 [J]. Public Choice, 2007(130).
- [11]Ram,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 - Country Samples [J]. Public Choice, 2009 (138).
- [12]Lana., Silvia. Investigating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How Important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15th Dubrovnik Economic Conference,2009.
- [13]Frey.B.,Stutzer.A.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04).
- [14]Wassmer,R.,Lascher,E.,Kroll,S.Sub- 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Ideology Matters [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05).
- [15]Helliwell, J. F. Huang, H. 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02).
- [16]J.C.Ott, Government and Happiness in 130 Nations: Good Governance Fosters Higher Level and More Equality of Happiness [J].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2011(02).
- [17]J.Teorell.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Government as Imparti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QoG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01).
- [18]Altindag,D.T.,J.Xu.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on Happiness [J].Aubur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1(08).
- [19]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
- [20]任海燕,傅红春.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J].求索,2012(03).
- [21]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J].金融研究,2016(08).
- [22]李清彬,李博.中国居民幸福-收入门槛研究——基于CGSS2006的微观数据[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13(03).
- [23]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0(11).
- [24]胡洪曙,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 (10).
- [25]赵新宇,姜扬,范欣.宏观税负、亲贫式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J].当代经济研究,2013(09).
- [26]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J].社会,2012(06).
- [27]罗泯,秦瑶.城市居民测度指标体系方案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2.
- [28]孙求华,林洪.国民幸福度量方法比较与应用研究[D].广东:广东商学院,2013.
- [29]陈刚,李树.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 (2006)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 2013(04).
- [30]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2(08).
- ◇ 作者信息: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 ◇ 责任编辑:何 眉
- ◇ 责任校对:何 眉